

金代女真国家文明的发生及其社会形态研究

李秀莲

(哈尔滨师范大学 金源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 要] 金代女真国家文明孕育在氏族部落阶段, 即“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向前发展为部落联盟, 高级部落联盟, 亦可称为“酋邦”。女真社会分层结构明显, 各阶层内部是平等的, 没有奴隶与奴隶主的对抗, 用奴隶制政权、奴隶社会不适宜概括金初社会。女真高级部落联盟向专制国家发展, 是社会形态的大跨越。

[关键词] 金代; 女真; 国家文明; 社会形态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8) 01-0162-05

金朝开国不同于中原唐宋王朝的改朝换代, 具有特殊性。起于部族社会的的大金国内在地具有早期国家, 或者说是国家起源时期的诸多特征, 外在地处于先进社会的包围中, 独立发展的机制遇到辽宋社会制度的遏制与干扰, 使之在形式上又兼有中原国家的诸多表征, 用研究唐宋历史的研究方法很难解决金朝开国时期的历史问题, 金朝开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要有针对性,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私有制、国家起源理论与金朝开国

认为金朝开国即进入国家状态的研究者, 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经典理论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 张博泉先生在《金史简编》一书的总论中讨论了“金朝女真族的社会性质”问题, 认为金朝开国即是奴隶制社会, 并划分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是太祖、太宗时的‘一如本朝之制’时期。这是阿骨打即帝位后, 确定的一条‘未改易旧俗’, ‘事无大小, 一依本朝旧制’的发展奴隶制的方针……

第二个时期, 是熙宗、海陵‘姑宜仍旧, 渐祈胥效’的时期。这条维护女真族奴隶制的方针, 是熙宗确定下来的, 海陵时无所变易。……第三个时期, 是世宗时女真族奴隶制的最后瓦解时期。”^{[1](P4)}

赵冬晖在《金代女真社会奴隶制度的特点》指出: 女真奴隶制的特点“带有家长制或家内制的特点, 属于早期奴隶制”^{[2](P91)}。

至 90 年代, 何俊哲等人在著《金朝史》时指出: “关于金代女真社会性质的问题, 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个重要问题上, 学者们的主张各异, 众说纷纭。我们认为: ……金初女真社会实际上是奴隶社会。”^{[3](P2)} 吾师李桂芝先生在《辽金简史》中称: “金政权是以女真贵族为核心, 联合契丹、渤海、汉人上层共同进行统治的奴隶制政权。”^{[4](P214)}

多数研究者认为金朝开国即为奴隶社会, 并已经进入国家状态, 这个结论是出于对“国家起源理论”“五种社会形态”的套用, 即原始社会后期, 剩余产品出现, 私有制、阶级出现, 进入奴隶社会。针对“五种社会形态”和奴隶制问题, 学术界的讨论经久不息, 虽然没有达成共

[收稿日期] 2017-11-15

[基金项目] 2016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阿尔泰语系诸语族亲缘、接触关系语言学‘假说’的历史学实证研究”(16YYD02)

[作者简介] 李秀莲, 哈尔滨师范大学金源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 北方民族史。

识,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奴隶制、奴隶社会,而且“五种社会形态”也不是世界各民族、国家必须的依次演进图式。有学者批评道:“‘五种社会形态说’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通观世界历史进程,‘五种社会形态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除了西欧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①。沈长云先生也认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那就很难说‘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5](P15)}金朝开国的历史是具体的,其历史的书写不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国家起源”理论所能代替的。女真人建立大金国前,生活状态、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部落,但外界社会的影响,使女真部落的文化水平、生产力水平远远超出原始氏族社会,阿骨打起兵、女真人凝聚起来建立大金国主要是辽朝契丹人的统治与压迫,与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不同。恩格斯在对雅典、罗马、德意志国家起源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6](P165)}

把金朝开国的历史确定为奴隶社会、奴隶制国家的论点主要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思想渊源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争论,受苏联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世界历史遵循着统一的发展模式的框架内,中国必然经历奴隶社会,甚至边疆民族的发展也概莫能外。50年代,马长寿先生撰有《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一文,声称“古代匈奴部落国家便是亚洲草原上最典型的一个奴隶所有者的社会”^{[7](P99)}。“比较其他阿尔泰语族,尤其是通古斯语族要前进了几百年乃至一千几百年”^{[7](P104)}。通古斯语族就包括建立金国的女真人,匈奴部落国家基础上存在奴隶制是建立在世界历史统一模式基础上的“假想”。所谓部落国家,其实就是部落联盟、高级部落联盟,联盟是建立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一旦联盟关系向奴役关系转化,联盟就已濒临瓦解。把濒于瓦解的部落联盟推向国家的途径之一是对外战争,通过对外掠夺,整合利益关

系,凝聚诸部力量,为建立国家奠定基础。

(一) 大金国的“前国家”观点

认为女真人建立的大金是奴隶制国家政权,这种观点居于20世纪金朝历史学术研究的主流。研究者把金初国家政体确定为奴隶制,主要制约于国家起源理论的单一化的认识。赵冬晖先生在《金初国家政体初探》一文中,试图解开金初政体上的迷雾,先分析了金初皇帝君权的虚无,又分析中枢机构勃极烈会议的权力职能,并清晰地认识到“金初的政体,应当有别于君主专制政体”,但在究竟为何种政体的问题上,陷入“奴隶制国家”^②的误区。赵冬晖先生把金初社会比定为奴隶制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古代世界,最初形成的国家即是奴隶制国家;其二,金朝勃极烈会议制度与奴隶主贵族会议的民主议事相合。在人类社会不同的时空下,相合的地方很容易找到。《金初国家政体初探》与《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存在的问题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民主议事仅仅是形式,不是根本,根据社会部分相似就判断他们具有一致性,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奴隶社会的根本表现在奴隶主与奴隶的阶级构成与对抗,金初社会是分层的,尚未形成阶级对立。

金初奴隶制观点之外也有不同声音存在,不过这种声音很微弱,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张宝才先生在《论完颜女真国家关系的确立过程及其特点》一文中指出:“国家是个动态的实体。国家的产生和国家关系的最后确立,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都不是同一的,它是一个过程。根据目前所能提供的历史材料,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阿骨打建立的收国是不完善和不成熟的……1141年,熙宗命下兼采隋唐之制,参宋、辽之法,类以成书,制成《皇统制》,这是女真国家第一部成文法律,它

① 季正矩的《关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若干争论》见2008年5月5日《北京日报》,据载:“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后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阐释,它发轫于苏联……“五种社会形态说”缺乏充分的文本依据……“五种社会形态说”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历史观造成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冲突,使当代人产生理论上的困惑。

② 赵冬晖:《金初国家政体初探》,《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65页。作者认为:“它应当属于哪种政体呢?在古代世界,最初形成的奴隶制国家,由于军事民主制的影响,往往采取贵族专政的君主政体,(严家其:《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在这种政体下,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一般还都存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权力,君权虽然已经产生,但不是无限的。笔者认为,金初的政体,就是这种政体。”

标志着女真国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国家关系的最终确立。”^{[8] (P86-87)} 张宝才先生通过对金朝开国历史的具体研究，很有见地地指出“阿骨打建立的收国是不完善和不成熟的”，也就是说还不能称其为国家，或说正在向国家过渡。当然，作者认为《皇统制》的出现标志国家关系的确立还有待商榷。

谢维扬先生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涉及女真所建立的金国及其酋邦问题，他说：“在东北地区出现由女真族（肃慎后裔）建立的金国。约在公元11世纪上半叶，女真族形成势力较大的酋邦，受辽朝控制。公元1095年后酋邦内展开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结果完颜部获胜。1113年完颜旻（阿骨打）使女真族形成统一的酋邦，始向外扩张。1115年，完颜旻仿汉族国家制度建立大金国，称帝。1125年金灭辽，次年灭北宋，先后都北京、开封，南部疆域达淮河、秦岭，西至甘肃，与南宋对峙，成为统治中国北方的王朝。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联合攻击下灭亡。金朝国家制度已属成熟。”^{[9] (P517)} 把金国纳入酋邦系统固然是学术研究的进步，但粗疏地概括未尽其所以然。

金朝开国起于氏族社会，其政权的性质具有明显的酋邦特征，首先，都勃极烈与诸勃极烈、万户、猛安谋克等构成“金字塔形层级结构”；其次，最高首领，不论称都勃极烈还是皇帝，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几乎没有行使什么统治权，太祖阿骨打、太宗乌乞买乃至熙宗完颜亶虽然称皇帝，但没有专制的皇权，更多的是调定权。最后，血缘关系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它是社会分层的依据，权力的分配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而定，与阿骨打亲近的人，成为诸勃极烈，次级关系的被封为万户，血缘关系具有突出的凝聚社会的机制与功能。当然，世界各地发生的酋邦政权没有统一的模式，千差万别^①。金初的酋邦政权处于军事征伐过程中，而且受到辽、宋高级社会的影响，向国家演进的步伐很快。尽管金朝开国于高级酋邦，具有酋邦的实质，但不可否定其在形式上已经具有国家文明的诸多表征。

（二）金朝开国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解答金朝开国是否是奴隶制国家的前提要摆正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李洪岩先生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奴隶社会：20世纪30年代的解答》一文指出：“围绕中国奴隶社会的争论，所蕴含的，也正是‘独特性’与‘普遍性’两种历史认知模式的分歧。”^{[10] (P10)} “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归根结底要

统一于客观世界，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五种社会形态论”以及私有制、国家起源理论阐释的核心内容是历史向前发展，社会向前发展是普遍性问题，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遵循的统一规律。至于如何发展，既可以是五种形态，也可以是三种形态，而且国家起源的方式也是具体的、多样的，这是历史的特殊性。历史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也就是说社会向前发展是普遍性的，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则是特殊性问题。金朝开国是女真社会向前发展的结果之一，这反映的是历史的普遍性问题，如何发展则是特殊性问题。

金朝开国后的发展道路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沿着女真氏族社会固有的秩序，充分发展酋邦体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进到国家。这是一条具有自我特色的发展道路，它在理论上是存在的，或者说在亡辽、灭宋前曾经完整地、短暂地存在过。第二，亡辽之后，辽朝的多元体制的选择出现在女真人面前。女真人在金初的一段时间内尝试了多元统治，金源内地有皇帝，勃极烈制度，万户领地；辽宋故地有枢密院、元帅府，东、西朝廷并立，州县和伪齐政权等。受制于女真人社会生活方式，多元统治不如辽朝契丹人成功。辽朝有三种统治制度，即汉地采用州县制度，契丹本地采用王权（称皇帝）制，北部、东北、西北采用部族大王府统治。从地理位置上讲，契丹人居于二者中间，或调动州县的物力，或调动大王府的人力，足以维持其南北统治的平衡。契丹人经济生活是比较成熟的游牧经济，在此基础上，辽朝采用行国体制，皇帝四季“捺钵”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分散各地、不同层次部族的统治。与契丹相比，女真人不具备实施多元统治的条件：“女真人隅居偏鄙，从地理位置上失去了裨闼契丹故地、东京辽阳的渤海遗民和女真部族、汉地州县等三方力量的优势；女真人生活方式是渔猎兼采集，以定居为主，无法像契丹皇帝那样通过四季‘捺钵’巡视属国、属部，维持多元体制的存在。”第三，女真人走中央集权的国家道路是被迫的，在第一、第二条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的选择。女真人在不自觉中接受了中原文化和帝王制度，这种“异己”的文化从内部破坏了女真社会固有的秩序与平衡，推

① 周大鸣主编：《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据分析：“酋邦不是一种划一的和铁板一块的社会形态，它是一种差异极大、形态各异的复杂社会。简单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高级酋邦已非常像早期的国家。”



动酋邦社会向国家转变。

二、女真完颜部“从头越”

活动于东北地域的族群历史演进过程中，虽然经历夫余国、渤海国等酋邦政权，但酋邦仅仅是部落联合体，远未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所以，渤海国酋邦政权瓦解后，社会又还原到部落林立，不相连属的分散状态。这就是人们疑惑不解的东北古代族群“从头越”^①问题的根源，女真人的崛起也经历了“从头越”。

渤海国被契丹人灭亡后，作为渤海国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靺鞨诸部析分离散，建立大金国的女真完颜部先民即在离散的靺鞨中。《金史·世纪》追溯大约在10世纪初，阿骨打完颜家族始祖函普从高丽来，完颜部处于氏族社会，与邻部的“交恶”“哄斗”是氏族社会阶段普遍存在的“血亲复仇”现象。至四世祖绥可率家族迁徙，确立了完颜家族的父权地位。昭祖以“条教”约束诸父，主要是整合家族的力量。在景祖时期，与乌春胡里改人、雅达唐括部等非完颜部一度联合，但很不稳定，而且联合体的首领还在争夺中。景祖从联合者雅达手里以“收买国相”，瓦解了完颜家族与雅达家族旧有的彼此平等的联合关系，昭祖转而开始并吞、征服包括恒赧、散达（雅达子）部在内的周围诸部，历经世祖、肃宗、穆宗、康宗的征讨与招抚，努力建立完颜家族具有领导权的新的联盟关系。据《金史》记载：“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金盖盛于此。”^{〔11〕}（P15）

至阿骨打继康宗位时，完颜家族的居住地域从来流水扩大到匹脱水，并与徒单、唐括、蒲察、挾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等部建立姻娅联盟关系^②。女真完颜部虽有发展，但在契丹人的眼里仍是“蕞尔小国”^③。契丹人视女真完颜部为“蕞尔小国”：一是指完颜部在历史上很弱小，常被周围邻部轻视。昭祖的棺柩曾被邻部夺走，世祖欲与乌春联姻，被斥为“狗彘”^④。契丹人也因完颜部弱小而放心地利用他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二是说明女真完颜部的联盟关系及其在联盟中的地位很不稳定，绝不是《金史》记载的夸张之词，诸如“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11〕}（P4）。完颜部的东征西讨仅仅争得与周围诸部的平等，得到与辽朝其他蕃部一样的地位，能参与天祚帝召集的诸蕃在混同江的春捺钵大会。

三、循渤海之旧，求大国册封

阿骨打攻打宁江州仅仅是意气用事，完全没有想到后果，当天祚帝屯兵出河店，大兵压境时，阿骨打惊慌失措，“罄额”痛哭，以苦肉计求援，撒改率部众声援，即稳定军心，又取得金朝开国的决定性胜利。阿骨打称都勃极烈，健全勃极烈官制，攻下黄龙府，“以娄室言黄龙府地僻且远，宜重戍守，乃命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

① 古清尧：《东北古代各族社会性质学术讨论会简记》，《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第78页。作者认为：“有的同志认为当前研究中存在一个问题是，讲发展的不平衡性多了，讲各民族间的渊源关系和文化的继承性或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少了，以致讲每个民族，都一律从原始社会讲起，有个‘从头越’倾向。”杨保隆：《肃慎挾娄合考》，第257页，作者指出：元明女真人的社会发展变化，“和金朝建立前相比，似乎无多大变化；和金时相比，似乎又倒退了。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从头越’，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就女真各部本身说，都在向前发展，不存在什么‘从头越’。当然，若从整个女真社会的发展看，似乎有‘从头越’，但这不惟女真时代如此，而是肃慎族系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点”。孙进己：《东北亚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页，指出：“由于这种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不平衡，就造成了一种被某些人称为‘从头越’的现象，即在同一地区反复出现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进程，在这些人看来，历史过程似乎不断在反复，不断在重演。其实不然，并非历史在重演，在反复，事实上这是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过程，往往是一个先进民族发展起来，进入了中原，另一个落后的民族迁来此地，又接着发展起来，这两个过程似乎是同一过程。实际上却是两个民族的不同发展过程。这是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所有落后民族都要独立地经历自己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过程，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也代替不了其他民族的发展。因此，在同一地区的反复出现所谓‘从头越’是必然的。”孙泓：《渤海文化的主体》，载马大正、金熙政主编《高句丽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该文称：“以往很多人常提出疑问，辽灭渤海后为什么这样一个‘海东盛国’就此烟消云散了，在渤海故土上形成的女真族，在文化上和渤海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别，相对不是先进了而是落后了。有人并因此把这种现象称为从头越。其实，其答案就在渤海统治下的广大靺鞨人并未接受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渤海文化，它们的文化仍保留着固有的、原始的靺鞨文化，因此，当辽代统治者把渤海国的一小部分统治民族迁走以后，其故地的靺鞨人不能不按他们原有的民族文化继续发展下去，就完全失去了往年‘海东盛国’的盛况。”

② （元）脱脱：《金史》卷64《后妃下》，第1528页，记载：“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挾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

③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9《肖奉先传》，中华书局2014年得到，第182页，记载：“方混同江诸蕃大会之时，天祚已疑阿骨打，密谓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当以事诛之，不然恐貽后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杀之伤向化心；设有异志，蕞尔小国，何能为？’天祚乃止。”

④ （元）脱脱：《金史》卷67《乌春传》，第1587页，记载：世祖“使与约婚，乌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处，岂能生育。胡里改与女直岂可为亲也。’乌春欲发兵，而世祖待之如初，无以为端”。

万户镇之”^{[12] (P31)}。阿骨打封娄室等为万户，走的是“封邦”建国之路，阿骨打一面对下裂土分封，一面乞求得到辽朝册封。

出河店之战后，辽朝为了缓兵，不断派使臣与女真商谈招降的条件。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阿骨打“率兵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辽使僧家奴来议和，国书斥上名，且使为属国”。四月，“辽耶律张奴以国书来。上以书辞慢侮，留其五人，独遣张奴回报，书亦如之”。六月“辽耶律张奴复以国书来，犹斥上名。上亦斥辽主名以复之，且谕之使降”。七月，“辽使辞刺以书来，留之不遣”^{[12] (P27)}。《金史》妄言辽朝与女真“国书”，扭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辽朝作为上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屈尊求和，向阿骨打谈的是招降的条件。《辽史》记载：“遣僧家奴持书约和，斥阿骨打名。”^{[13] (P331)}辽朝以上国向女真下诏书，而不是“国书”，在诏书中斥阿骨打名，册封“属国”，是正常的事。

不断取得胜利的阿骨打不满意辽朝给予的条件，攻城掠寨的女真人在利益驱使下也不会停下进攻的脚步，双方都在拖延时间，集结力量。收国二年、天辅元年，辽朝与女真没有议和活动的记载。此间，辽朝忙于镇压内乱，辽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1115年）九月，耶律章奴反，谋立魏国王耶律淳。十二月，耶律张家奴叛。天庆六年正月，东京有变，渤海高永昌僭号。八月，乌古部叛^{[13] (P334)}。阿骨打军乘机“攻下沈州，复陷东京，擒高永昌。东京州县族人痕孛、铎刺、吴十、挹不也、道刺、酬斡等十三人皆降女直”^{[13] (P334)}。

阿骨打的力量不断壮大，开始向辽朝提出和谈的条件。天庆七年，阿骨打接受渤海文士杨朴建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封册。”^{[13] (P336)}八年二月，阿骨打再与天祚帝书曰：“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归我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质；还我行人及元给信符，并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则可以如约。”^{[13] (P337)}七月，阿骨打三遣使与书曰：“免取质子及上京、兴中府所属州郡，裁减岁币之数。‘如能以兄事朕，册用汉仪，可以如约。’”^{[13] (P338)}

辽朝在军事上连连败北，不得不向阿骨打妥协。六月丁卯，遣奴哥等赍宋、夏、高丽书诏表牒至金。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议册礼。九年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离毕事萧习泥

烈等册金主为东怀国皇帝”^[28]。作为上国皇帝能做到的天祚帝已经做了，也就是说天祚帝的让步已经达到极限。至于阿骨打拒绝接受辽朝册封，不是辽朝方面的问题，而是阿骨打的问题。

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之后出现的酋邦政权徘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独立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杨朴建言求大国册封，实际上是循渤海之旧。当年，大祚荣东归建国，接受大唐册封为渤海郡王。这是杨朴建言的历史根据，但渤海的情况与阿骨打的情况不同，面对能够灭掉高丽的大唐，大祚荣无论如何都不敢小视，大唐是绝对的上国，大祚荣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只有接受唐朝的安排。阿骨打所建立的酋邦政权及其所面对的辽朝不同于渤海国与唐朝的情况，随着彼此力量的消长，辽朝仅是形式上的上国。阿骨打求辽册封本身就自相矛盾，既求辽朝册封，又不接受辽朝的安排，求册封的内容已经超越册封的形式所能包容的限度，不是求册封，而是逼迫天祚帝投降。求辽朝册封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是金初酋邦政权固有的内在矛盾的反映，一面努力寻求独立发展的可能，另一面不得不接受外在的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 [1] 张博泉. 金史简编[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 [2] 赵冬晖. 金代女真社会奴隶制度的特点[J]. 社会科学辑刊, 1984(5).
- [3] 何俊哲, 等. 金朝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4] 李桂芝. 辽金简史[M]. 福州: 福建大学出版社, 1996.
- [5] 沈长云. 新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前瞻[J]. 史学月刊, 2016(6).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马长寿. 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J]. 历史研究, 1954(5).
- [8] 张宝才. 论完颜女真国家关系的确立过程及其特点[J]. 求是学刊, 1986(5).
- [9] 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李洪岩. 中国到底有没有奴隶社会: 20世纪30年代的解答[J]. 文史知识, 2004(6).
- [11] 脱脱. 金史·卷1: 世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2] 脱脱. 金史·卷2: 太祖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3] 脱脱, 等. 辽史·卷28: 天祚帝纪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